

[文章编号] 1002-5685 (2010) 05-0016-07

吴满有：典范生产的典型案例

□ 朱至刚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以典范的生产流程为考察线索, 从社会结构和历史情境对吴满有现象的成因进行剖析。笔者认为吴满有所以能够成为典范, 是因为他既符合四十年代初期宣传新民主主义人物的需要, 还符合陕甘宁边区形象建构的需要, 又因为符合领袖的偏好而被边区认可为典范。此类典范人物的生产流程反映的是看重当前需要的工具理性, 而非着眼于道德的价值判断。

[关键词] 吴满有; 典范生产; 工具理性

Wu Manyou: A Typical Case in Paragon Making

ZHU Zhig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With an in-depth inspection into the flow of paragon mak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Wu Manyou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ontext. Basically, it holds that the reasons why Wu Manyou was deemed to be paragon in Shensi-Kansu-Ningsia Border Reg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se: pandering to the propaganda demands of the New Democracy paragons; catering to the needs of establishing a regional paragon in Shensi-Kansu-Ningsia Border Region; coinciding with the leader's preference. Furthermore, it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flow of these paragons merely reflects the emphasis on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 rather than long-term moral considerations on value judgments.

Key Words: Wu Manyou, Paragon Mak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吴满有是近年来逐渐被历史学界和新闻学界关注的研究对象。此前论者或以他是否变节为中心, 考察梳理其经历。¹ 或从政治策略的角度, 考察“吴满有运动”在陕甘宁边区群众动员过程中的作用。² 或以相关言论作为切入点, 推测吴满有被奉为典范, 跟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观念倾向的内在关联。³ 或是着眼于业务研究, 剖析吴满有的形象建构如何体现了当时的政治需要, 又对后来的典型报道模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⁴ 对于这样既因为历史情境的纷繁而呈现出多重面目, 又对后来的历史进程, 尤其是典范人物的

生产产生了复杂影响的历史现象, 自当有多维度的观照。这些研究成果分别从不同的侧面, 揭示了“吴满有现象”的状态和成因, 也是后续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石。

笔者认为在传播研究, 尤其是典范生产的取向下, 尚需从历史情境和社会结构的层面, 对吴满有现象得以生成的外部环境、内在动因, 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做出研判。作为农民, 而且是富农的吴满有为何会被选中成为典范人物? 在他被发现到倾全边区乃至全党之力宣传的过程中, 又透射出当时宣传机制和权力结构的哪些特征? 在认定为典范后, 吴满有的形象

[收稿日期] 2010-04-20

[作者简介] 朱至刚, 男,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又是被怎样持续得从重构?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三个问题,也是试图藉此管窥典范生产内在机理的观察路径。

吴满有何以能成为典范

以1935年为界,吴满有的经济状况前后截然不同。他是在陕北“闹红军”、搞土改的直接受益者,又身兼军属和工人;同时,在发家致富之后雇佣长工的他又是新生富农。若以1948年以后的农村政策为标尺,以这样的阶级成分,虽可保障在政治运动中不受到直接的冲击,但也绝无成为典范人物的可能,但是却正切合当时和当地的现实需要。

(一)当时的需要:新民主主义农民的典范

所谓当时,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较之抗战初期,国内的政治格局正呈现出多重的变数。皖南事变后,在仍以日本为共同对手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合作已在事实上终结。随着苏、美参战,盟国取得最后的胜利已是时间问题的大背景下,国、共两党、“第三势力”等各派政治力量,都逐渐开始为应对战后的国内事务提上议事日程而谋划、活动。但相对于国民党而言,又仍处在明显的弱势,此时还必须化解根据地正在面临的严重困难。在仍然坚持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展社会基础,团结、整合其他社会力量既是中共的长远之计,也是当前要务。在各种可能的联合对象中,占到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农民当然是首选对象。

中共诚然在搞农民运动,争取农民方面早就具有了始发优势,但是直到解放区土改以前,农民在党的社会理论中的法理地位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并无本质区别,农民被看且只被看作是联合的对象。此前论者多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所说“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⁵视作中共开始高度重视农民的标志性论述。但必须将其放置在具体的语境下,才可能理解这样说的真实用意。按照毛泽东的解释,新民主主义就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根本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任务尚未完成之前,应该是所谓“一切有良心的人们”应该共同遵奉的共同纲领,也应该是建构整个社会体系的根本原则。换言之,在这个不可逾越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只要任何人信守这三大政策,那么他的道路选择就值得认可,有资格成为被中共的宣传

机构颂扬的对象。至于他在经典的马列主义阶级划分标准中处在怎样的经济地位,属于哪个阶级,是否正在获取剩余价值,那并不重要。此时毛泽东将农民设定为革命的主力,并不是对他们无条件的认可和推崇,而是基于对基本国情和当下形势的认识,所拟定的阶段性策略。⁶

落实到宣传工作上,就必然将体现为既要农民的份量摆放在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但是低于无产阶级及其领袖的位置,同时又要用符合新民主主义标准的农民形象来感染和教育他们。此时对新民主主义农民的宣传和颂扬,与对开明绅士、对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对作为反法西斯盟国的苏联、美国的颂扬,都是出于在新民主主义的整体框架下的阶段性需要。将延安时期对新民主主义农民的颂扬与诸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拉甫罗夫等俄国民粹主义者对村社农民,章太炎、梁漱溟等中国文化本位者对乡村农人,以及中共自己对产业工人那种无条件的认可和推崇等量齐观,应该说都是只见现象,而未明理路。⁷《新民主主义论》面世于1940年,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已是全党事实上的领袖,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没有获得完全的优势。直到整风期间,新民主主义这种与经典马列主义颇有不同的思想观念才被全党在事实上接受。⁸倾全党之力,对各种新民主主义典范人物的发现、宣传也就到了1942年,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二)当地的需要:陕甘宁农民的典范

所谓当地,是指1942年前后的陕甘宁边区。后人在述及1936年—1947年的陕北时,常以“延安时期”一语蔽之。但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来,这一词语遮蔽了太多值得关注的具体事实。在这段时间里,不仅驻延的中央机关在组织结构和指导思想都有明显的嬗变,而且延安社会也并非陕甘宁边区的全部,驻延的“机关人”也并非就是延安社会的全部。辖有5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的陕甘宁边区在社会状况的复杂程度上,当居国内各政区前列。在这块区域内,虽有如延安“机关人”那样,大致3万人堪称荟萃半国英才的精英群体,还有装备训练只能说是差强人意的数万部队,但是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却是文化程度和经济状况甚至低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准的农民。正如毛泽东所说“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有100多万文盲,2000名术士,广大的群众还在受迷信影响”。⁹在地理区位上,陕甘宁边区处在被中央军、晋军、甘马、宁马、伪北平政府的包围中。身处四战之地,农业生产条件欠佳,机关人员又食指日繁,这就是为何1941年—1943年的边区在经济上格外

困难的原因所在。为了应付眼前的困难,边区政府又不得不从1941年开始,对辖下的农业人口课以重税,导致此后一段时期内,农民与政府的关系颇为紧张。¹⁰其他各派政治势力对边区社会,尤其是如绥德、关中、等接壤地带的渗透能力都不容小觑。¹¹如果不能迅速而有效地在农民中巩固和增进威信,边区政府实在前途堪虞。

再者,陕甘宁边区在党内具有双重身份,它在法理上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处在平等位置。到了四十年代初期,陕甘宁边区的人口数量、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在各根据地中只能排在中下水准。¹²但它同时又是中共中央的驻地,在日常事务上直接受中央领导。在战争状态下,各根据地既遵奉中央号令,又在相当程度上必须各自为政,党权、政权还必须以军权为依托。如果远离战争的边区在克服当前困难,改善社情民生方面不能取得更加立竿见影的成绩,那就不仅无法对其他根据地起到示范作用,而且还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中央在全党范围内的权威。无论就自身现状还是从在全党、全国的特殊地位而言,凭借各种手段,让边区各界和全党、乃至全国确信,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取得,而且已经取得了不仅超越国统区,而且还高出其他根据地的显著业绩,都是边区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当务之急。在此情形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会在以根据地报道为主要对象的同时,又明显倾斜于陕甘宁边区了。为什么虽然陕甘宁边区的人口仅占有所有根据地的不到2%,但是如吴满有、赵占魁、王保林、张思德、李鼎铭、艾青、丁玲这些分别代表着新民主主义农民、工人、军人、乡绅、知识分子的典范人物都在这里及其附近被发现,又被倾全党之力宣传。

综上所述,如吴满有这样,既是土生土长的边区农民,又是中共农村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直接受益者,是被建构成新民主主义农民典范的绝好素材。而他在主动缴纳沉重税负的同时,还能做到发家致富,又可以作为说明边区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佐证。这类人物的被发现、被宣传,在当时当地也就是近乎必然的了。

吴满有如何成为典范

在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到底有多少像吴满有这样的“人物”?由于缺乏相关的统计资料,已经难以估

算。但是从吴满有成名以后,立即就出现了如杨朝臣这样的挑战者看来,至少他在边区,甚至是延属专区也并不见得就是绝无仅有。如果当时《解放日报》的记者莫艾没有参加延安县的春耕会议,那么他就不会开始关注吴满有;如果没有莫艾的极力推荐,也就不会有《解放日报》的连续报道,更不会因此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和青目。如果就事论事来看,这一系列的升级都颇带几分偶然。但从社会结构的层面着眼,却可以看到吴满有的成名何其典型地揭示了在典范人物的生产过程中,既有的传播状况和权力机制起到了怎样重要的作用。

(一) 毛泽东眼中的吴满有

传媒要进行连续而频繁的关注、报道,必须以能够便捷的接触被采访对象为前提。吴满有家住在柳林区的吴家枣园,距离县城60里路程。¹³在当时整个延安汽车寥寥无几的交通条件下,正好是一日之内,可以徒步往来的最远距离。可以说,对于此时需要顺应形势需要,积极而频繁的报道新民主主义农民典范的《解放日报》而言,吴满有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唯一的选择。同样堪为农民典范的刘玉厚,由于家住在距离延安300多公里的绥德,获得《解放日报》光顾的机会就要小很多。吴满有理所当然就从柳林区、延安县的典范人物成为《解放日报》的典范人物。《解放日报》又不仅是延安的报纸,同时它还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而且在1941年—1947年间,它还是延安地区唯一的一份日报。在级别、发行范围,还是读者的地位上,都远非边区其他传媒可比。即使在毛泽东那里,也是了解边区状况的重要信息渠道。对于此时的毛泽东而言,吴满有也是唯一既吻合他籍以号召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冲破周边经济封锁的需要,又能被他通过报刊媒介,虽然间接,但是频繁认识到的人物。在此等传播状态下,毛泽东专门召见莫艾,就吴满有的问题长谈4个小时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为何在毛泽东做出积极评价以后,吴满有就迅速成为了全区、全党共同认可的典范人物?乍看上去,这似乎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但是这“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却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全党、全国都习惯了把“毛主席”放置在“党中央”之前的思维定势使然。按理说,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在党内已经身兼政治领导和精神领袖,但在法理上,个人的观念要上升为全党的决议和共识,还必须履行必要的组织程序,单凭跟党报(即便是中央机关报)记者的一席谈话更属不足为训。况且如果要细究起来,毛泽东从未在边

区政府内担任任何职务。但在毛泽东做出评价,到陕甘宁边区在群众大会上正式宣布吴满有为全边区劳动英雄的过程中,再到该年5月,《解放日报》刊出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却看不到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程序的影子。

其实党内也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就在《开展吴满有运动》刊出后,《解放日报》社在1943年2月2日就收到赵长远的来信,赵长远在信中质疑如果不论其经济性质,能否把富农方向当作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性质和革命方向的根本问题。¹⁴在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中,他的质疑确有根据。中央党务研究室专门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于3月15日做出来长篇回应。信中认为将吴满有虽然是富农,但是他是新民主主义体制下的新式富农,又是共产党员,跟旧式富农有根本差别。在新民主主义体制下,当前就是需要发展富农经济,“要产生更多的吴满有”。¹⁵不仅不应该禁止他们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而且还要反对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各种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的残余”。¹⁶比起后来的“扣帽子”、“打棍子”来,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自然有可取之处。但到1945年七大以前,新民主主义思想还并未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研究机构和党报以此为判别观点对错的依据,与其说是在为吴满有申辩,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在维护领袖的个人权威。为了要维护领袖的个人权威,也必须要将被他认可的吴满有进一步确立为典范。

(二) 文化界笔下的吴满有

在与莫艾谈话以后,毛泽东在1942年年底的边区高干会上再次正面提及吴满有。他说吴满有已经是一个富裕农民了,“他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¹⁷其实从这两次谈话的措辞中,都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对吴满有的态度并非是全无保留,更不是倾心敬仰。恰恰相反,他对吴满有始终只是肯定他是劳动模范,始终在强调宣传他是当前的战略需要,并没有将对吴满有的褒扬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比起他本人后来对张思德、雷锋等人的评价高度来,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但是也许连毛泽东本人都没有预料到,在他两次对吴满有表明态度后,整个延安和边区都望风响应。文化机构更是全员动员,除了《解放日报》等中央级媒体进一步加大了宣传力度以外,作家、诗人、

木刻家也纷纷用自己的作品加入了歌颂吴满有的行列。在毛泽东所划定的“他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的范围内,文化界对吴满有的歌颂调门越来越高。例如1943年3月9日,《解放日报》用整版发表了艾青的长诗《吴满有》,《新华日报》也在6月29日选载,同年新华书店还出版了单行本。¹⁸

为什么领袖的态度有所保留,文宣机构却不吝加以冕袞?透过长诗《吴满有》中的几行,也许就能依稀的看到原因。“问你吴满有:‘谁带给你好日子’你说:‘毛主席!’你说没有他,你就活不成;你说他到那里,你就到那里”。诗人的意图表露再直白不过。¹⁹诗人的意图表露得相当直白。艾青也因为创作了《吴满有》,在1945年1月的边区群英大会上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文化工作者。大会对他的评语是“整风以来,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于去年赴吴家枣园调查,写了《吴满有》的诗篇,并给吴满有朗诵……这首诗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影响许多大后方的青年向往延安,宣传了我党在边区的经济建设”²⁰

(三) 从吴满有看典范的生产模式

透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吴满有成为典范人物的过程中,相对于吴满有自己是谁,又做了什么而言,领袖的权力和权威起到的作用更加重要。先不谈毛泽东对当前局势,以及宣传吴满有在当时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的认识存在多大的合理性,单就做出决定的方式看来,吴满有的确仅是因为适合了毛泽东此时的个人意志而成为了官定的典范人物。具体而言,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1.领袖人物或是出于自己的个人偏好,或是出于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凭借个人权威为当前要选取何等人物作为大力宣传的典范,划定大致的标尺。2.宣传部门的具体执行者根据这一标尺,在可能接触到的范围内寻找、选定符合标尺的人物。3.在未必经过组织论证和认可的情况下,领袖人物透过自己对传媒机构的影响,全权决定以什么样的基调、什么样的途径来建构和宣传被选定的典范人物。4.在领袖拟定的宣传口径内,宣传部门的具体执行者通常会将声势越造越大,调门越来越高。而且通常会通过或明示,或暗喻的方式,将典范人物何以会成为楷模归因于受到领袖的直接影响。

在宣传典范人物的背后,领袖既是全程的掌控者,也是最终的受益者。从吴满有开始,同样的生产流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断的因时所需产出各种类型的典范人物。从吴满有到陈永贵,从赵占魁到王庆喜,从张思德到雷锋、孙玉国,从李数仁到李庆霖,

甚至从刘少奇到华国锋,在这些各行各业的典范人物的不断被发现,不断被宣传乃至不断被替换的生产流程背后,另一个身影被持续得建构、不断的伟大,乃至最终走上了神坛。这种典范人物的生产流程又并非是这位最大的大人物的专利。不管出于任何具体的原因,只要社会的话语权分布出现了明显的失衡,以典型报道为代表的典范建构就必然会随时随地得层出不穷,而且颇为得势。在这种生产流程背后,起到关键作用看似是控制者这种那种、此时彼时的观念倾向,但是往更深的层次说,却是举凡存在之物,价值有无多少,都由当下的功利目的为评价标准的工具理性使然。与其说典型报道是源于民粹主义、社群主义、道德至上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还不如说是源于在面对事实时的实用主义。

被重构的吴满有

典范人物在被选定和认可以后,后续的命运又将如何?吴满有在1943年以后的三个人生阶段也恰足以体现三种可能的走向。在吴满有那里,1943年1月到1948年4月的他体现的是第一种走向:在既定的框架内被继续建构,而且被不断地根据现实需要承载新的具体使命。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在“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的框架下被不断强化着既有的公共形象。其实说“被”也未必全对,吴满有不仅对临老方至的幸运很是受用,而且还主动参与到对自己的典范建构中,尤其是很善于使用《解放日报》这个在边区独一无二的传播平台。1943年春节刚过,他就透过《解放日报》发表了写给毛泽东的公开信“亲爱的毛主席,我计划为你代耕两石细粮。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我能为你代耕,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情”。²¹吴满有不识字,此信肯定是出于代笔,但是代耕细粮的主意还真是非农民难以想出来的。再如在1943年2月,也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应战书,就明显比杨朝臣的挑战书高出一筹,他不仅爽快地应战,而且还提出要开展村与村之间的劳动竞赛,进而引起全区军民劳动的大竞赛,引发全边区丰衣足食。²²与此同时,吴满有还随着局势和时事的变化,在公共视线内被分派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在个人关系上,他日益受到领袖的青睐,被毛泽东亲自指定为毛岸英的农艺老师。在边区,他被任命为南枣园乡乡长,被选为边区参议员,甚至还开始以农民当

然代表的身份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甚至将最早公开将边区政府称为“人民政府”,也是他的杰作。²³同时,《解放日报》为了彰显他作为农民的业绩,不惜浮夸甚至造假。²⁴

不管确有其事,还是出于误会,吴满有在1948年4月以后却成了第二种走向:在既定的框架之外,被另一种框架建构成另一种典范的典型。1950年3月,延安县委组织部召集柳林村党员大会,当众宣布开除吴满有党籍,并把他定性为边区最大的叛徒。其实纵使不发生广播的事情,吴满有未必见得会声光依然。自从三十年代末的“审干”以来,被俘人员被猜疑、被闲置,就是事实上的组织纪律。而且,随着中共中央的东迁,继而在解放区开展土改,继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身为边远地区富农的吴满有纵不是再无宣传价值,只怕也是要如秋扇见捐了。也就在吴满有黯然退场的几乎同时,赵占魁、刘玉厚等人在媒体宣传中的位置也逐渐被来自东北、华北的王崇伦、王国藩所取代。

作为自然人的吴满有于1959年郁郁而终,作为党员的吴满有在1980年,在当年《开展吴满有运动》的作者,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力主下得以平反。但是作为典范人物的吴满有却在被尘封多年之后,成为了第三种走向——被学术研究的眼光来进行着解构(或者说是进行着另一种建构)的典型对象。

结语

无论就其人其事,还是就可以从中折射出的典范生产机制的完整和深度,还是从被继续重构的方式来看,吴满有都堪称是典型报道中的典型案例,典范生产中的典范产物。因此不管是在任何时候,他的多重面目,尤其是作为社会人的吴满有和被媒介建构的吴满有之间的区隔和关联,以及产生这种区隔的原因,都是从新闻生产的角度应该时时警醒的存在。

注释:

- 1/13/15/16/17 李锐:《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炎黄春秋》,1994年,第4期。[Li, Rui, "Did Labor Hero Wu Manyou Really Sell Out?", *Yan Huang Chun Qiu*, 1994, 4. (in Chinese)]
- 2 高娜:《陕甘宁边区的吴满有运动及其意义》,《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张瑞敏:《从“吴满有方向”看党的群众基础的扩大》,《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Gao, Na, "Wu Manyou Movement and

-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Shensi -Kansu -Ningsia Border Region”, *Journal of Ya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0, 1; Zhang, Ruimin, “Examine the Expansion of CPC’s Popular Basis from ‘Wu Manyou’s Direction’”,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04, 8. (in Chinese)]
- 3 阳海洪:《论民粹主义与典型报道的起源》,《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4期。[Yang, Haihong, “Origin of Populism and Typical Reporting: An Analysis of the Report on Wu Manyou”,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10, 4. (in Chinese)]
- 4 李嘉树:《典型报道的滥觞——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中华传媒网,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982>, 2008-12-28. [Li, Jiashu, “The Source of A Typical Report: the Report About Wu Manyou on Liberation Daily in Yanan”,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982>, 2008-12-28. (in Chinese)]
-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2页。[Mao, Tse-tung,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2nd ed.,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p.692. (in Chinese)]
- 6 毛泽东并没有把农民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阶级,而是把他们按照经济状况分别划分到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之列。(参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页。[See Mao, Tse-tung, “Analysis of the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2nd ed.,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pp.3-9. (in Chinese)].) 1945年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还专门强调“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使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0页。[Mao, Tse-tung,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p.320. (in Chinese)])
- 7 毛泽东是否具有民粹主义色彩,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甚为热烈的话题。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当肇始于胡绳在1999年发表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Hu, Shen, “Reevaluation on Mao Tse-tung’s New Democracy”, *Party History Research*, 1999, 3. (in Chinese)])。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要做出恰当的论断,需要先厘清民粹主义是什么,在当前学界,“民粹主义”对应的英文词汇是“populism”,对应的俄文词汇是“Популизм”。由于对近现代中国产生影响的主要是“Популизм”这一类型。所以此处就仅拿它来跟延安时期中共与毛泽东的思想做比较。如拉甫洛夫、多尔古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民粹主义者在经济上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文化观念上他们认为,文化的进步是以人民的血汗为代价的,因此获得文化的“少数人”必须抱有负罪感,以对人民的服务来偿还自己的债务;他们既反对任何的学科规制,又将道德主义视为评价精神文化的唯一标准,并且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参见刘建国、马龙闪:《论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观》,《哲学研究》,2005年,第12期。[See Liu, Jianguo & Ma, Longshan, “On the Cultural View of Russia’s Populism”,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5, 12. (in Chinese)]; 保·塔格特著,袁明旭译:《民粹主义》,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Taggart, P. A., *Populism*, Jili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in Chinese)]; Avrich, P., “Anarchism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Russi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66, 3. 1940年至1945年期间的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态度,在《新民主主义论》和《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表达得很明白:“在无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8页。[Mao, Tse-tung,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2nd ed.,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p.678. (in Chinese)])“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2-323页。[Mao, Tse-tung,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pp.322-323. (in Chinese)])即便是

- 胡绳先生本人也只是认为毛泽东是在建国以后,才逐渐偏离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滑向以民粹主义来对待资本主义。将他和中共在延安时期对如吴满有等农民典范人物的宣传归结为民粹主义观念使然,与事实并不相符。
- 8 新民主主义思想提出的初期,曾遭到质疑。当时仍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王明在1941年10月7日就对毛泽东直言,在当前处于孤立的情况下,“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72页)。[CCCPC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Biography of Ren Bi-shi*,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1994, p.472. (in Chinese)]直到延安整风期间,它才被党内高层普遍接受,例如彭德怀在《民主政权和三三制政权》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在抗战的几年中,对于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有持久战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是辉煌的杰作。(代序《论毛泽东思想》,选自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江苏,苏中出版社,1945年,第14-15页。[Mao, Tse-tung, “On Mao Tse-tung’s Thoughts”,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1)*, Jiangsu, Su Zhong Publisher, 1945, pp.14-15. (in Chinese)])陈毅则称赞它是“一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及社会实践问题上新旧争论的最正确的解决,这是一本马列主义的创新著作,也是一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光荣代表。(陈毅:《伟大的二十一年》,选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江苏,苏中出版社,1945年,第8-12页。[Chen, Yi, “The Great 21 Years”,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1)*, Jiangsu, Su Zhong Publisher, 1945, pp.8-12. (in Chinese)])
- 9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选自《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1页。[Mao, Tse-tung, “United Front in Cultural Work”,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2nd ed.,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p.1001. (in Chinese)]
- 10 据《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0日,边区政府该年度征收定额为203400担粮食和25948200斤饲料。绝对数量和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份额都约为上年度的两倍。
- 11 据国民政府调查局:《陇东之阴谋》第80页—第81页称,在1937年—1940年间,在陇东就因国共双方摩擦造成15738起伤亡事件,其中4639起造成人命。近半数伤亡者为政府官员。直到1940年,中共才完全掌控了绥德和陇东。(转引自[美]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Cited from Selden, M.,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2002, p.171. (in Chinese)])
- 12 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总人口约150万,军人和其他脱产人口约7.3万人。由此估算作战人员当在4万左右。(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00页。[Li, Wei-han, *Memories and Researches*, Beijing, CPC History Inform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6, p.500. (in Chinese)])。同时其他几个大区的人口数大致是晋察冀1500万人,晋冀鲁豫2500万人,山东区人口2500万人,作战部队16万人,华中区人口1500万人,作战部队10万多人。
- 14 赵长远(1906-1944),亦名赵作霖、赵梅生。山西省平顺县人。1926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至1930年4月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1930年6月至9月,任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北京大学中1932年任中共山西汾阳特委书记。1938至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做统战工作,与叶楠等人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任组织部长。1940年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庆阳陇东中学任副校长。1943年在“抢救运动”中蒙冤受屈,1944年病逝。((赵作霖),昆明党史, <http://kmds.km.gov.cn/dsbl/dsrw/xyz/2622353579642JKKB896EEEE4I42JKKB896EEEE414.shtml>。)18/19/20/21 鲁艺:《吴满有其人其事》,《山西档案》,2006年,第4期。[Lu, Yi, “Wu Manyou: the Man and His Deeds”, *Shanxi Archives*, 2006, 4. (in Chinese)]
- 22 《解放日报》1943年2月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54年。
- 23 《解放日报》1944年2月29日头版头条是《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报道称吴满有在发言中说人民的政府力量大,咱们八路军、政府、老百姓联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是一颗心,就啥都不怕。他还说“一个要求,不要封锁边区,让我们的报纸发出去,叫全国大家看看,咱边区怎样实行民主的,我们的办法对不对。。一个建议给蒋委员长,请他按照陕甘宁边区一样,建立民主政府,把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开荒、种地、纺线,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把日本打出去”。(《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解放日报》,1944年2月29日。
- 24 1942年10月29日的《今年丰收 吴满有特别好》报道“吴满有村子上一般每垧约打五斗至六斗,但是他却打到八斗”。1943年1月8日的头版头条——《(引)劳动英雄吴满有(主)计划今年扩大生产(副)种地八十五垧努力发展副业 勤锄草多施肥增产粮十余石》——报道吴满有“去年(1942年——笔者注)已耕地六十垧”。但是1944年1月1日的《吴满有和吴家枣园》却报道吴满有“这年(1942年——笔者注)种了七十七垧地,打了四十二石粮食”。“两组数据打起了“内战”。(转引自李嘉树:《典型报道的滥觞——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中华传媒网,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982>, 2008-12-28。[Cited from Li, Jiashu, “The Origin of Typical Reporting: the Report about Wu Manyou from Liberation Daily in Yen-an”,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982>, 2008-12-28 (in Chinese)]